

罗小才：部队里的“叫花子”情报员



个人简介：罗小才，1927年出生，1942年参加革命，1952年退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多次扮演“叫花子”、“商人”探取军情，立过二等功、三等功。

在部队里，罗小才有个外名叫“叫花子”，因为参军以后，罗小才多以“叫花子”形象示人，然而就是这个“叫花子”，送过不少情报，也刺探过不少敌情，还曾智取过敌军两挺“歪把子”机枪。采访中，罗小才说，他参军有点“不得已”，十几岁那年，身边有个熟人经常拿个小纸条让自己送到这、送到那。那时候年龄小，也不懂事，只知道送纸条能有好东西吃，没想到那个熟人是地下党。久而久之，他被汉奸们发现，并被当成小八路告诉了鬼子，鬼子想杀了他。一天晚上，那位熟人连夜将他带走，并乘火车先后前往山东、沈阳，最后停留在哈尔滨，他在那里参了军，那年他只有15岁。

罗小才说，部队里的领导看他年龄小，不能上战场，就安排他和另外几个年龄小的战士上街摸情况。年龄小，目标也小，敌人想不到他们是当兵的，打探起敌情也更方便。为了防止身份泄露，参军很多年，罗小才都没有穿过正式的军装，穿的大多是老百姓衣服。部队每次发军服，他都是领了钱出去做老百姓的衣服穿。就这样，罗小才有时是“叫花子”，有时又是“商人”，并利用这些身份干起了侦察兵工作。“你别看这‘叫花子’，作用大着呢。”罗小才介绍说，“叫花子”都有团队，势力不小，许多“叫花子”都和城内外的鬼子岗哨熟悉，他跟着那些“叫花子”，也熟悉了一些鬼子岗哨，平时要来的钱大多也会“孝敬”鬼子。

罗小才说，鬼子们在城内外不少地方设立哨卡，有的是用沙包堆成一个土堆，围成一个口子型，派3、4个鬼子兵负责看守，有的是一个小亭子，看守的鬼子兵也有2、3个。时间长了，他与鬼子兵也就熟悉了。熟悉了便好办事。一次，他买了一壶酒，并在酒里下了点蒙汗药，送到了一岗哨那儿，鬼子喝了下去后，没多久就睡着了。趁他们睡着后，罗小才通知战友，让他们将放在沙包上的2挺“歪把子”机枪拿走，并送到部队去。类似这样的智取还有不少，自己也因此被部队领导表扬，荣获过二等功、三等功。

罗小才说，自己平时刺探的敌情多，部队里的领导都知道有他这个“叫花子”，也非常相信他，有一些重要情报会点名让他去送。在部队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但提起“叫花子”，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解放战争时期，罗小才脱离了“叫花子”的身份，真正地穿上了军装，并随部队参加过平津战役等，后来在战斗中受伤，至今胸口仍有个枪眼。受伤后，罗小才选择了去后方工作，曾送参加抗美援朝的大部队至鸭绿江口，直至1952年，罗小才选择退役返回家乡。 杨晓莉

黄宇森：三垛河伏击战曾和鬼子当面拼刺刀



个人简介：黄宇森，1925年出生，1943年3月份入伍，1943年5月份入党，曾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退伍。

近日，记者前往城南医院采访抗战老兵黄宇森，老人正静静地坐着看抗战电视剧。老人的子女告诉记者，虽然老人已经几乎听不见了，走路也需要有人扶着，但平常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因为那样，能让他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那段烽火岁月。

在谈起从军往事时，黄宇森陷入沉思：“我父亲在我刚出生没多久就去世了，我和哥哥两人由母亲抚养长大，因为家境贫寒，不到15岁，家人就送我到邻村一大户人家打长工。大概过了两年多，有一天我在村里遇到一位新四军领导，也许是看中我脑子灵活，胆子大，他让我回家征询家人意见，能否让我参军。”黄宇森说，为了给家庭减少负担，也为了谋一条活路，时年

18岁的他瞒着家人参加了新四军。因为在部队表现出色，屡次立功，黄宇森很快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参军不久，就被火线批准入党。

采访中，黄宇森告诉记者，整个军旅生涯当中，他经历过许多战役，最难忘的是在三垛河打的伏击战。1945年4月，苏中军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迎来抗日大反攻的新形势。日军为了阻止苏中军民的战略反攻，命令盘踞在宝应县城的日伪军，调往兴化南面的周庄驻防，妄想进一步封锁、分割和“蚕食”苏中抗日根据地。在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新四军上级领导决定调集三个团和一个分区特务营的兵力，在三垛东至新庄一带，对日军和伪军进行一次伏击战。而黄宇森所在的部队也有幸参加了那次伏击战。“战斗打响前，我们就一直趴在老百姓的屋子上打掩护。在战斗打响后，战士们看到日伪军进入了我军事先准备好的‘口袋’，便把子弹、手榴弹等像暴雨般投向敌群，沿河上下顿时一片爆炸声。”黄宇森说，许多参战将士都表现英勇，在把身边的子弹打光后，毫不犹豫地 and 鬼子拼刺刀。而黄宇森也在那次战斗中，直接赤膊上阵面对面和鬼子拼刺刀时，在胳膊上留下了很长的刀疤。

打完三垛河伏击战后，黄宇森又和他的战友们一度转战到江南一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上级指示，黄宇森所在的部队回乡进行整编和学习。1950年，黄宇森从部队退伍，转业到地方工作。

如今，已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黄宇森，仍时常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子女们听，并常常教育子女：“虽然现在生活好了，不愁吃穿，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牢记历史，不忘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生命的革命先烈。” 管玮玮

向抗战老兵致敬(七)

黄如清：用“钢圈套”制服4个小鬼子



个人简介：黄如清，1930年出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1956年退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和队长一起俘虏过鬼子哨兵，立过三等功。

“我是背着父母参军的，那时候家里有点条件的很少会让孩子去参军。”在马棚卫生院，得知记者来意后，正在输液的86岁抗战老兵黄如清说，家里兄弟二人，自己是老大。小时候，家里条件养活两个孩子不是难事，但他偷偷地瞒着父母报名参了军，那年15岁。

黄如清介绍说，因为年龄小，被领导安排进入了地方部队，虽然没有在一线与鬼子们正面交锋过，但也曾与鬼子们打过一些“交道”。那时候，地方部队武器装备较差，他参军

后只配发了2颗手榴弹。他白天大多数时间躲在黄草荡里，晚上出来刺探敌情。“我们俘虏过4个鬼子，都是在没有枪的情况下。”黄如清说，每次晚上出来活动时，他们都会带着事先自制的“钢圈套”，就是用钢丝围个圈，然后缝上大布袋，里面装着稻草灰。有一次，他与队长一起出来，趁着天黑，悄悄前往敌人一办公处，看着门口站岗的哨兵正在打瞌睡，便趁机摸上前去，用“钢圈套”套住他们的头，俘虏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到部队，领导从他们身上获取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用这种方法，黄如清和战友前后俘虏过4名鬼子，也因此受到过部队领导的表扬，荣立过三等功。

黄如清说，那时候除了痛恨鬼子外，还非常痛恨汉奸。因为汉奸常常将地方部队的一些情况告诉鬼子，让鬼子来围剿部队。一次，鬼子们前来围剿，看见有人躲进黄草荡，便下令放火，试图烧死他们。那时候躲在里面的不仅有士兵，还有少数老百姓，眼看着火势越来越猛，离大家越来越近，没有带任何工具的战士和老乡使用手将四周的草全部拔掉，大火才没有烧过来。鬼子以为我们插翅难逃，没多久便离开了。从那以后，每次躲进黄草荡，他们都会带着刀，把周边的草割掉，以防敌人再次放火。

黄如清说，那时候在黄草荡一躲便是一天，全靠伪装成地方老百姓的后勤工作人员送饭进来。有时候遇到鬼子，食物被抢，人被杀，他们只能在黄草荡里忍饥挨饿。

黄如清说，解放战争时，他真正地上了战场，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孟良崮战役、渡江战役等知名战役，小仗打过无数。“打死敌人再正常不过，身边许多的战友都牺牲了，自己能够活下来真的非常幸运。”黄如清说。 杨晓莉

周鉴开：军民同心是抗战胜利的保证



个人简历：周鉴开，1927年3月出生，1943年1月入党，1943年3月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在部队一直负责思想宣传和地下组织工作，曾担任过宣传科副科长等职，1981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抗日战争期间，我虽然没有直接扛枪上战场打鬼子，但我一直都在做抗日的事。日本侵略者破坏我们家园、杀死我们亲人的种种罪行让我们知道，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日前，记者在市人民医院采访抗战老兵周鉴开时，提起自己当年抗日的那段经历，已89岁的老人仍记忆清晰。

周鉴开说，他出生在高邮甸垛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死得早，家里有兄妹5人，自己是老大，从懂事起，日本鬼子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

非常凶残。“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甸垛乡下，每到秋收时节，日本鬼子就会下乡到各个村扫荡，一看到哪家百姓有粮食，他们就抢；一瞧见鸡鸭鹅，就上去夺。有时候，老百姓不给，他们用火直接烧掉村民的房子，或者用刺刀当场刺死村民。”周鉴开说，有一年，他亲眼看到村里的一位老大娘，为了保护自家的一点粮食和鬼子纠缠，结果被鬼子刺了十几刀身亡。上学期间，周鉴开是全校有名的进步学生，经常被进步的学长们带着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并于1943年1月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组织上考虑到周鉴开能识文断字，将他送到汉留区公所，让他在当地部队做了一名文书，专门负责宣传和文件收发工作。在此期间，周鉴开常会接触到一些党报党刊，而每一次只要看到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发表的讲话或者我军又打了一些重要战役时，他都会第一时间抄录和整理，并及时向部队的战士们传达和学习。

1945年8月，因为战争形势的需要，周鉴开从汉留被调到三垛附近的一个乡镇当乡长，开展地下抗日工作。周鉴开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组织地方力量支持抗日。“有一次，我们的队伍和日本鬼子在三垛开战，双方交战非常激烈，为了支援前线，我带头组织全乡所有壮劳力上前线，帮新四军用担架抬伤员，给他们送粮食和后勤补给。老百姓积极性都非常高，有的甚至是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周鉴开说，正是得益于军民的同心，最终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了中国。

为了继续保存革命力量，从1946年开始，周鉴开先后辗转江西、湖北多地隐蔽。直到1949年南京全面解放后，周鉴开才重新回到家乡找到部队。1981年，周鉴开正式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 管玮玮